

苏联共产党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здание четверт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2

根据苏联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72 年版译出

苏联共产党历史

〔苏〕波诺马廖夫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7.25 字数 641,000

1974 年 6 月第 1 版 197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11171·52 定价: (共两册) 2.15 元

内 部 发 行

第十二章

党在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时期。

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

(1929—1932 年)

1.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苏联在全面展开社会主义进攻时期的国际形势

1929 年底，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次威力极大、历时极久的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生产下降延续了约 3 年之久，1932 年降到了最低点。美国在这个时期的生产比 1929 年几乎减少了一半，德国减少了 40% 以上。

经济危机引起了规模空前的失业。单是美国的失业人数就达 1 500—1 700 万人之多。德国在 1932 年约有 44% 的工会会员成了全失业者。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是长期性的。它使所有资产阶级国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

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局面，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革命化了。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可以调和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无危机地发展的改良主义理论都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在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的影响增长了。例如，德国共产党在 1932 年 11 月的国会选举中就获得了约 600 万张选票。

1831000

苏联的成就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愈来愈大。全世界劳动人民中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在反动的资本主义集团中间,武装干涉的情绪又抬头了,阻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破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的企图加强了。帝国主义者不敢对苏联发动战争,但是他们组织对苏联国民经济的破坏活动,开展诬蔑性的宣传运动。先是罗马教皇领导的教士的反苏攻击,接着就大肆造谣说苏联实行虚张声势的倾销,后来又编造出苏联实行强迫劳动的荒诞神话。对苏维埃国家的诽谤真是层出不穷。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法国、波兰、比利时)的统治集团利用反苏宣传来削减苏联的出口,拒绝贷款给苏联。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展开了一场真正的经济战。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政策中还存在着一种相反的倾向。在经济危机时期,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工业品来说,苏联市场的重要性是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对于象机器制造业之类的一系列重要工业部门是有决定意义的。有势力的实业界对苏联定货的兴趣,多多少少妨碍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反苏阴谋。对苏维埃国家充满深厚同情的工人群众则反对实行敌视苏联的政策。

这个时期的国际局势始终是紧张的。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反动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代表人物都企图用战争和掠夺别国土地的办法来摆脱危机。

日本最先走上了侵略的道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未经正式宣战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几省(满洲)。在远东出现了战争的策源地。苏联政府再次声明,苏联劳动人民同情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列强则采取了另一种态度。虽然日本的扩张也触犯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实质上却在鼓励侵略。西方列强打算挑起日

本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和平政策。党保住了和平,没有让敌人把苏维埃国家拖入国际冲突。然而,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苏联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强远东边疆的国防。武装干涉者制造阴谋诡计,他们在苏联组织各种破坏活动,世界资本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战争策源地在邻近苏联远东的地区出现——所有这一切外部因素,使党和苏联人民有责任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用相当大的力量和资金来提高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以便击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可能的侵犯。

2. 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开展。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当危机震撼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却在不断地高涨。五年计划头两年的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20% 以上。

随着我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声势浩大的集体农庄运动也展开了。到 1930 年初,集体农庄建设的五年计划大纲已经基本完成。全国有许多地区,集体农庄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盘集体化。农民整村地加入集体农庄。在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和乌克兰草原区,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区最多。

向全盘集体化过渡表明基本农民群众彻底转向了社会主义。苏联在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开始以前共有个体农户 2 450 万户,其中约有 850 万户贫农,1 500 万户中农和 100 多万户富农。农民(贫农和中农)是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小农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本身会不断分化出富农-资本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走上了摆脱富农盘剥和资本主

义剥削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

集体化是苏联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折点。在集体农庄建立以前,农民使用一些简陋的工具,从事个体劳动。耕地常常用的是木犁,收割粮食用的是镰刀和大镰刀,打谷用的是链枷,马和牛用来作牵引力。在小块土地上无法使用拖拉机和其他新式机器。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基本农民群众转向集体农庄,意味着从落后的、小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先进的、集体的、使用机器的大农业。甚至只是把全部农具牲畜集中起来使用,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率也会有显著的提高。在使用拖拉机和其他机器的情况下,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就看得更清楚了。采用新技术的集体劳动,使农民有可能扩大播种面积,提高耕作水平,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可见,集体化是苏联农业中最深刻的革命变革。这个变革的基本内容是把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大生产。由于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体系就在农业这个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中巩固下来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根子被拔除了,资本主义成分复活和农民分化的基础被摧毁了。集体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劳动组合的经济和他们投入其中的个人劳动。

由国内的整个发展进程酝酿起来的农村中这一伟大的革命变革,是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倡议和领导下,在工人阶级全力支持和广大劳动农民群众积极参加下实现的。

声势浩大的集体农庄运动要求修订集体农庄建设的五年计划,规定全国各个地区实现集体化的期限,确定实行集体化的形式和方法。为了研究这些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在1929年12月成立了一个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

阿·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最大的党组织领导人：安·安·安得列也夫（北高加索）、К. Я. 巴乌曼（莫斯科州）、И. М. 瓦累基斯（中央黑土州）、菲·伊·哥洛舍金（哈萨克斯坦）、斯·维·柯秀尔（乌克兰）、М. М. 哈塔耶维奇（伏尔加河中游）、鲍·彼·舍博耳达耶夫（伏尔加河下游）等。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中央委员会规定要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基本上完成集体化。同时，也慎重地考虑到了各个边疆区、州和民族共和国的不同条件和农民对集体化的不同的准备程度。

中央委员会按照集体化的速度把全国划分成三类地区。第一类包括最主要的产粮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和中游。这些地区的集体化预定在1931年春天基本上完成。这些地区的集体化准备得比较充分。它们得到了数量较多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这里农民的分化比较深刻，阶级斗争比较尖锐，贫农组织得比较好，机械化的大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比较多，农业合作化发展得比较快。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在实行集体化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第二类包括全国所有其他的产粮区：乌克兰、中央黑土州、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这些地区的集体化预定在1932年春天基本上完成。在其余的边疆区、州和民族共和国，集体化预定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即1933年基本上完成。

党中央遵循列宁关于对农民实行生产合作化的指示和列宁制定的党纲，同时根据全盘集体化地区的经验，规定集体农庄建设的基本形式应当是农业劳动组合。农业劳动组合对土地使用权、耕畜、农业机器、农具、经营用建筑物、产品牲畜实行了公有化。农业劳动组合不同于共耕社和公社，它能把集体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公

共利益最恰当地结合起来，因而容易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个体农民。

党中央还采取了种种办法来加速建设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各种农业机器的工厂。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机器拖拉机站开始为集体农庄服务。在1929—1930年经济年度，集体农庄共得到5亿卢布的贷款。国家拨款帮助集体农庄进行土地规划。为了培养集体农庄的干部，普遍举办了短期训练班。

党中央号召所有的党组织去领导从下面发展起来的集体农庄运动。中央的决议严厉地警告，既要反对阻碍集体农庄运动发展的企图，同时更要反对用任何从上面“发号施令”的办法来领导集体农庄运动。

中央的决议明文规定了对待富农的新政策——**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富农是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是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约占农户5%的富农，在1927年大约拥有谷物播种面积1000万公顷（总面积为9470万公顷），提供了全部商品粮食的1/5。在地主和资本家被消灭以后，富农就成为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一个支柱。他们抗拒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组织反苏维埃的暴动，杀害农村积极分子，千方百计地企图奴役贫农和中农，使他们听任自己摆布。在1918年和1928年，富农曾两次疯狂反抗，妄图使苏维埃国家断粮，从而破坏苏维埃国家采取的社会主义措施。他们以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他们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能够做到恢复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梦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各国资本家也都把希望寄托在富农身上。

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起，党就实行了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和排挤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苏维埃政权用土地租佃法和关于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法律来限制富农的生产规模，限制富农剥

削劳动农民的可能性。苏维埃政权向富农征收高额赋税，要富农按固定价格卖粮食给国家。限制政策抑制了富农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并不等于消灭它。

列宁曾经指出，同富农不能和睦相处，工人阶级必须作好准备，以便给予富农以毁灭性的打击。列宁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同富农进行直接的国内战争，将来也会是这样。”^①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警告全党说，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②。

党和苏维埃政权依靠 1930 年以前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同富农展开了最后的斗争。

社会主义成分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巩固下来；工业迅速发展，农村出现了几万个集体农庄。我国的阶级力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改组。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有了增加，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加强了。消灭国内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中农加入了集体农庄，他们和贫农一起对富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党和苏维埃政权现在已经不仅能够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和贫农，而且能够坚定地依靠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并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

此外，到 1930 年，苏维埃政权已经有了代替富农的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由于集体农庄的蓬勃发展，完全可以肯定，在 1930 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至少可以提供 4 亿普特的商品粮食，这就是说比 1927 年富农所提供的商品粮食多几倍。

①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134 页。

②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 卷，第 626 页。

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不断增长，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苏维埃国家有了生产粮食的巩固基地，这就使党能够在1929年底从限制和排挤富农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剥夺富农生存和发展的生产来源：土地的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租佃、雇佣劳动力的权利。这个政策已经在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关的各项决定中从法律上确定下来。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关于个体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法律。

全盘集体化就是把全村或全乡的土地交给集体农庄支配。属于这片地区的富农土地也都交给集体农庄。富农不仅失去了租佃权，而且也失去了他们所使用的土地。土地国有化保证了有利于集体农庄的土地规划的实行。列宁指出，土地国有化使“无产阶级国家有最大可能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①。集体农庄既不必向农民赎买土地，也不必因土地转归集体使用而给农民报酬，因为苏联已经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了。

富农对集体农庄大肆诽谤，散布各种流言蜚语，烧毁集体农庄的经营用建筑物，毒死牲畜，毁坏拖拉机和机器，暗杀农村共产党员、集体农庄主席、报刊的农村通讯员和农村积极分子。他们用尽一切办法破坏集体化。因此农民在转向全盘集体化的同时必然要进行一场反对富农的坚决斗争。农民要求苏维埃政权机关完全剥夺富农，并把他们从本村本乡驱逐出去。

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贫农和中农的斗争，撤销了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命令。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有权把富农迁到离他们定居地很远的地区去，没收富农的全部生产资料（牲畜、机器和其他财产）归集体农庄所有。富农被彻底剥夺了。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699页。

对富农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唯一正确的措施。这些措施符合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利益,保证了集体农庄运动的胜利,保证了集体农庄的巩固。

机器拖拉机站在建立和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28年敖德萨州舍甫琴柯国营农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1929年6月,党中央根据舍甫琴柯机器拖拉机站良好的工作经验,认为可以建立一个组织和领导机器拖拉机站的全苏中心(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管理总局)。在1929年,由农业合作社机构和集体农庄联合组织建立的拖拉机队也非常普遍。但是,实践证明,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技术装备还是掌握在国家手里比较好。年轻的集体农庄当时没有资金来购买拖拉机和其他机器,并且也没有技术干部。

苏维埃国家考虑到这一切问题,就把技术上为集体农庄服务和培养机械化干部的责任完全承担起来。这从政治方面看也有重要的意义。机器拖拉机站是苏维埃国家领导农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它们已经成为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群众的工具。

因此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一开始,党就用争取集体农庄制度胜利的具体斗争计划来武装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党中央关于农业劳动组合是农民实行生产合作化的基本形式,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关于国家拖拉机站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等决议的各项原则,发展了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在联共(布)中央通过1930年1月5日的决议之后,各级党组织就加强了集体化的工作。农村共产党员首先加入集体农庄,带动了贫农和中农。到1930年春天,从事农业的农村共产党员差不多有3/4加入了集体农庄。

党提出了“苏维埃面向集体农庄!”的口号。苏维埃成为党在农村的新政策的贯彻者。7万多个村苏维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团结了将近400万贫农和中农积极分子。农村的积极分子成了集体农庄运动的倡导者。

党支持城市工人参加集体化工作的日益强烈的愿望。1930年,工会派出了18万个工人工作队到农村去组织集体农庄和修理机器。25 000名工作队队员——1930年初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参加集体农庄工作的先进工人,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人都是由各工厂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各工厂的集体派出的志愿人员。这25 000名工作队队员中约有70%是共产党员。

共青团是党的积极助手。到1930年春天,农村的共青团员约有一半(55万)加入了集体农庄。共青团在农村成为集体农庄青年的组织。

1930年1月和2月是集体农庄蓬勃发展的两个月。到2月20日,加入集体农庄的已达1 400万户左右,约占全部农户的60%。这时达到的集体化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央委员会一月决议所预定的水平。然而,在集体农庄建设取得真正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错误。

列宁曾经指出,农民从个体的私有经济转向集体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艰巨最复杂的任务。列宁警告说,在建立集体农庄时,不容许用暴力对待农民,特别是对待中农。他号召要十分慎重地来处理这件事情,要估计到农民留恋他们的经营。列宁起草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对中农的态度”也强调指出:“在这件事上过分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加强中农对新事物的成见。”^①恩格斯当年就曾指出不能操之过急。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1分册,第573页。

1930年初集体农庄建设的实践表明，列宁的这些重要指示在许多场合遭到了破坏。

首先是列宁规定的自愿原则遭到了破坏。许多地方不是在农民中间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而是采取行政手段和从上面发号施令。农民往往是在“剥夺富农财产”、褫夺选举权等等的要挟下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在许多地区，“被当作富农剥夺财产的人”达15%，被褫夺选举权的人达15—20%。

党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基本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的指示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出现了不少组织公社把包括小牲畜和家禽的全部牲畜强行公有化的事实。

照顾全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的原则也遭到了破坏。集体化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的各民族区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许多州打算成为先进地区。例如，中央黑土州和莫斯科州党委预定要在1930年春天完成集体化，而按照中央委员会的一月决议，中央黑土州至少还有2年时间，莫斯科州至少还有3年时间。北高加索、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这些民族区的党组织也力图不落在这些州的后面。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满情绪。

这些错误首先是由于解决千百万农户的集体化问题的各种困难所造成的。苏联是在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历史上第一次解决这个任务的。

这说明党的干部对在农村实行新的阶级政策不完全理解。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这个新口号，是党的政策的急剧转变。过去，每当急剧转变，党总是在规定自己新方针的同时，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或者中央全会上说明这种新方针的依据。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都是在弄清党的政策的实质以后，以充分理解的态度来实现党的政策的。在群众性的集体农

庄运动初期,这种惯例被破坏了。1929年底,斯大林在一次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布了党的新口号,过了几天,这个新口号就在中央一月决议中规定下来,甚至没有再召开中央全会对新口号加以说明和解释。地方各级党组织和从事集体化工作的人数众多的党的干部都无法一下子理解农村新政策的实质。许多人把这种政策看作是采用行政手段的指示。他们不是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剥夺富农财产,而是在组织集体农庄之前用要挟“剥夺富农财产”来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

陶醉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初步成就,由上面层层施加一定的压力和追求各地集体化的高百分比等现象也出现了。对集体化过程的领导已经跟不上集体化的规模了。集体化主要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但是,这个基本问题在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初期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月6日才公布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而这个章程也是不明确的。章程根本没有谈到宅旁园地问题,也没有说明牲畜公有化时农户还拥有的一头奶牛如何处理,小牲畜和家禽是否要实行公有化。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首先是富农,利用了集体农庄建设中的错误。从前的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暗藏的反苏维埃分子也积极活动起来了。敌人是阴险狡猾的。他们使用了一切手段,从挑拨离间直到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农村积极分子。阶级敌人煽动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把牲畜统统宰掉,他们散布谣言说,反正在集体农庄里什么牲畜都会被人拿去的。不少农民受了富农的挑拨,宰杀了奶牛、猪、羊、家禽。在1929—1930年经济年度,我国牛的总头数减少了1460万头,猪减少了1/3,绵羊和山羊减少了1/4以上。这些牲畜主要都是在1930年2月和3月间杀掉的。畜牧业遭到了严重损失,以致长期不能恢复元气。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指望集体农庄建设中的过火行为和错误会

激怒农民，会激起农民举行大规模的反对苏维埃的叛乱。他们希望利用部分中农一时的不满情绪，把这些中农拉过去。在个别地方，他们也确实煽起了一些反苏维埃的行动。

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破坏党在集体化整个工作上的威信，也企图在某些方面利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困难。

集体农庄建设中的错误给集体农庄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害。工人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发生了破裂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党中央这时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党中央已成为对集体农庄运动实行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司令部。中央建立的各种有关集体农庄建设问题的委员会不停地工作。许多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入地方，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的机关的领导人经常向中央委员会报告集体化的进度，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由于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和它的坚定性、灵活性，实行集体化过程中的错误和缺点才逐步得到纠正。

2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召开全国各民族区的党组织领导人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各民族共和国以及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各民族区实行集体化办法的决议。中央委员会警告各级党组织不要在这些地区硬搬集体化准备工作做得较好地区所采用的那些形式和方法；建议集中主要注意力按照各该地区的民族特点和经济特点进行集体化的准备工作。

2月下半月，正当全国许多地区出现农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危险征兆时，党中央就立即采取措施来纠正集体农庄建设中的错误。

2月下旬，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的许多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会议，讨论集体化问题。从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视察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米·伊·加里宁、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等人在会上发了言。在

会上发言的人都指出对公有化的问题缺乏明确的指示，并批评了打算加快集体化速度的做法。这次会议对纠正集体农庄建设中的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

2月底，党中央在总结这次会议的工作时，对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作了修订。1930年3月2日，在报刊上公布了这个章程。章程使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得到了澄清。同一天，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在报刊上发表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这篇文章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文章阐明了党在集体农庄建设中的政策，强调了集体农庄建设中的自愿原则，谴责了对农民施加行政压力的做法。文章受到了农村的中农群众的欢迎。这篇文章还指引党的干部去纠正正在集体农庄建设中所犯的错误和过火行为。但是文章没有充分揭示出造成这些错误的上述原因，而把主要的责任推到地方工作者身上。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党组织却碰到了新的困难：出现了大规模退出集体农庄的现象；富农及其代理人竭力诋毁集体农庄和集体化的政策。但是共产党员并没有被这些新的困难所吓倒。各级党组织显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才能，迅速地进行了重新整顿。党组织对已经走上集体农庄道路的贫农群众和中农群众开展了团结工作，刹住了富农反对集体农庄的活动，巩固了新的集体农庄。富农反对集体农庄活动的势头开始逐渐减弱，农民退出集体农庄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了。

1930年3月14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决议指出：这种对党的路线的歪曲是“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对我们的阶级敌人的直接帮助”^①。中央委员会责成各级党组织停止强迫实行集体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4分册，第119页。

化的做法，同时要继续不断地努力吸引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集体农庄，集中注意力使集体农庄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固定和巩固下来。

党清醒地分析了农村中已经形成的局面，并且着手去消除所犯的错误。党组织果断地采取措施使农村形势正常化，集中主要的注意力按照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建立新的集体农庄。错误和挫折并没有动摇党坚信列宁规定的合作社计划和集体化方针的正确性。党向农民群众说明集体农庄的道路是摆脱富农盘剥、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集体农庄的道路才能使农民过自由、幸福和光明的生活。

坚决有力的纠正错误，使农民群众安心了。列宁规定的对待中农的态度又重新恢复起来。敌人利用中农的不满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被粉碎了。

党为了巩固集体化的成就，还实行了一系列的补充措施。4月2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优待集体农庄”的决议。集体农庄和庄员免缴2年牲畜税。集体农庄从国家手中得到6100万普特的无息种子贷借。社会主义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在以突击的速度建立起来。1930年6月，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制造厂和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开工生产。扎波罗热收割机制造厂已经开始生产联合收割机。其他许多农业机器制造厂正在建造和改建。1930年春天，为集体农庄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为158个，到1931年夏天已经增加到1228个。机器拖拉机站共有拖拉机62000多台。

党消除了集体农庄建设中的错误，巩固了集体化的初步成就。诚然，一些勉强建立起来的“纸糊的”集体农庄垮掉了，动摇的农民退出了集体农庄。集体化的百分比下降了，集体农庄减少了。但是，这并不能贬低主要的成就，即苏维埃农民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坚定不移地相信党和苏维埃政权政策的正确性的农民群